

陆建伟 / 著

走出封闭的世界

茗溪流域开发史研究



序 言

陆建伟先生所作《清代苕溪流域中上游的开发和环境变迁》及《略论六朝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经济圈的形成》两篇文章,是其主持的浙江省社联课题“走出封闭的世界——近代苕溪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这项课题计划的重要性及学术价值在于:

一、这是有关浙西苕溪流域——明清两代的湖州府及其所辖归安、乌程、德清、武康、安吉、孝丰、长兴各县——地域社会研究的极少数课题之一,以往学者的著述大概只限于浙西水利及城市聚落发展史方面(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滨岛敦俊),本课题拟较全面地研究以苕溪流域为重点的社会经济史,选题有其创新意义。

二、本课题的重点成果之一是地域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颇能顺应中外学界近年来重视环境史的研究新潮,极有历史学术研究及现实参考的意义。这类研究课题,非常值得重视与鼓励。

三、本课题研究的某些论点可能限于篇幅,只是重点摘要。但就某些章节而言,如专论《苕溪流域垦殖及外来移民》,运用方志资料具体扎实,所述棚民与新作物的传入,特别是清朝历年的疫情灾荒的量计统计,极为完备,很有参考价值。如运用区域开发理论,对苕溪流域开发史的研究,亦颇见新意。

总之,本书选题新颖,史料周全,立论有据,应值得奖助鼓励。

若深入探讨,相信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及环境史的研究,必能做出具体的贡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刘石吉

2004 年 8 月

作者简介

陆建伟，男，1965 年出生，浙江海盐人。1987 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现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苕溪流域开发史。目前已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清史研究》、《福建论坛》、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近 20 篇论文，撰有《浙北历史与文化》（合著）、《湖州古城文脉》（副主编）等学术著作。

目 录

导 言

- 一、问题的提出 (1)
- 二、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 (6)
-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9)
- 四、本书研究的意义 (13)
- 五、本书的分析框架与基本思路 (15)
- 六、本书所征引的文献说明 (17)

上篇 苕溪流域的早期开发

第一章 苕溪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

- 一、苕溪流域水系概况 (23)
- 二、苕溪流域自然生态环境 (30)

第二章 苕溪流域早期聚落的历史考察

- 一、早期聚落遗址的分布 (33)
- 二、早期聚落的演变 (37)
- 余论 从东苕溪的变迁看良渚文明的兴衰 (39)

第三章 苕溪流域的早期开发——秦汉时期

- 一、秦汉时期苕溪流域的人口集聚和水利建设 (46)
- 二、苕溪流域早期次中心点的形成 (51)
- 三、秦汉时期苕溪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55)
- 余论 秦汉时期苕溪流域开发的不平衡性 (57)

第四章 苕溪流域的首次勃发——六朝时期

- 一、六朝时期苕溪流域的水利建设 (62)
- 二、人口的持续集聚 (64)
- 三、县域的设置变迁 (66)
- 四、六朝时期苕溪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69)
- 余论 略论历史时期流域经济圈形成的标志 (73)

中篇 苕溪流域的繁荣与扩张

第五章 苕溪流域的进一步开发——隋唐时期

- 一、江南运河的贯通与苕溪流域的水利建设 (81)
- 二、人口的持续集聚和县域的变迁 (86)
- 三、苕溪流域市镇的雏形 (88)
- 余论 流域系统开发的特征及裂变 (91)

第六章 苕溪流域的繁荣——两宋时期

- 一、两宋时期农田水利建设 (95)
- 二、两宋时期苕溪流域的人口增长 (100)

三、两宋时期苕溪流域经济探析	(102)
----------------------	-------

四、苕溪流域市镇的形成	(106)
-------------------	-------

余论 两宋时期苕溪流域社会经济的总体评价	(110)
----------------------------	-------

第七章 苕溪流域的进一步繁荣——明清前期

一、明清时期苕溪流域水利农田建设	(117)
------------------------	-------

二、明清时期商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124)
------------------------	-------

三、明清专业化市镇群的兴起	(127)
---------------------	-------

四、明清时期苕溪流域商路	(133)
--------------------	-------

五、苕溪流域区域市场的繁荣	(137)
---------------------	-------

余论 明清时期苕溪流域市场的特征	(142)
------------------------	-------

下篇 走出封闭的世界——苕溪流域的近代转型

第八章 近代交通与苕溪流域的水路

一、近代交通的引入	(152)
-----------------	-------

二、轮船对苕溪流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158)
------------------------	-------

三、民国时期苕溪水利建设	(160)
--------------------	-------

第九章 上海开埠与近代苕溪流域区域市场的形成

一、区域出海口的地理转移：

澉浦——乍浦——上海港	(162)
-------------------	-------

二、上海开埠与苕溪流域腹地经济变迁	(164)
-------------------------	-------

三、苕溪流域近代区域市场的形成	(169)
-----------------------	-------

第十章 苕溪流域资本在江南早期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以浔商为例

- 一、浔商形成的过程 (176)
- 二、浔商群体的特征 (179)
- 三、浔商在上海都市圈中的作用和地位 (182)
- 四、浔商的衰败 (186)

第十一章 20 世纪 30 ~ 40 年代苕溪流域社会经济个案研究

- 一、菱湖乡土重建——农村现代化的一次努力 (189)
- 二、30 ~ 40 年代南浔镇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193)

第十二章 苕溪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 一、苕溪流域中上游的垦殖 (199)
- 二、苕溪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 (203)
- 余论 略论流域经济生态开发 (212)

后论 对流域开发的总体思考

- 一、区域开发模式 (216)
- 二、流域开发的一般特点 (218)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6)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是关于江南次流域——苕溪流域开发史的研究。

苕溪流域是太湖流域开发较早的区域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而在新石器时代，又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江南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近代上海的开埠，更是在上海都市经济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苕溪流域的研究，既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长江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

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区域史研究方面。笔者在此主要是回顾对本书写作起到了影响的学术成果。

从专门史研究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江南市镇与市场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学者加藤繁先后发表了《关于唐宋的草市》、《宋代都市的发展》等论文，开始了对中国地方草市的研究。从20世纪50~6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探讨，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史地位，逐渐在学术界得到了重视。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了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被视为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拓荒之著。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刘石吉先生连续发表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等文章，较多地论述了上海开埠与太平天国对江南市镇社会经济的影响。刘先生的研究对于笔者在论述近代苕溪流域开发史，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研究的复兴，对江南地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领域，都逐渐得到拓展和深化。陈学文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了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城镇经济的研究，编纂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和《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二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台湾学者刘石吉称《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的江南市镇资料选辑”。他的嘉兴、杭州和湖州三府市镇的个案研究，对市镇社会经济结构作了深刻的剖析，足显陈先生学术功力之深厚。陈先生新近发表的“明清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研究”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创建性的见解。尤其是关于民间商书和太湖流域商路的研究，更使笔者受益匪浅。

樊树志先生从专业市场及区域贸易这一角度，展现了江南市镇的总体面貌。陈忠平对江南市镇的布号布庄及手工业、徽商作了详尽的考察。范金民从江南支柱产业——丝绸业着手，进而对整个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并开创了江南商帮研究之先河。李伯重则对经济史学界长期较忽视的生产力状况

——农业生产、工业原料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进而与英国模式作了极富启发的比较。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则以史料丰厚见长。张海英从江南自然环境出发，详细论述了明清江南区域市场及与全国、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反映了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陶水木则从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圈的关系这一视角，论述了浙江商人群体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陈国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古代城镇史和宋代江南社会经济方面。包伟民先生则立足近代江南市镇的变迁，较多地涉及了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史方面。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近代江南市镇最为详实的成果。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对江南社会史方面。赵世瑜先生从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余新忠则从医疗社会史这一独特视角，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德国地理学家 W·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对区域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冀朝鼎于 1935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与转移着手，阐述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地理基础。美国人类文化学学者施坚雅（Skinner）在 1964~1965 年《亚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以及 1977 年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

市》书中，提出了“施坚雅模式”，采纳了中心地缘说、城市空间网络说、等级规模说，从而创立了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至今仍对我国学术界起着重要影响。日本学者鹤间和幸则以河川水系为着眼点研究地域史。

陈桥驿先生关于绍兴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历史时期绍兴聚落地理和鉴湖环境的变迁的研究，为苕溪流域的研究提供了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范本。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从区域史角度对宋代江南社会经济作了深入探讨，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关于区域史研究方法更给笔者以直接启发。本书之所以把苕溪流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来研究，并且能提出一些见解，应该归结于斯波义信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读者将会看到。

在已有的对江南区域研究中，尽管在许多领域都已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状况，仍然留下了许多理论空缺。如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时期流域经济圈的形成发展以及区域开发的不同模式等等，都少有涉及。

具体说来：

其一，大多侧重于江南宏观区域方面，而对于同一区域内的差异性，则较少研究。

正如日本学者斯波信义所说的，历史学家对于地域差异问题的研究，“未必就积极地探索，并填补这种研究上的空白。”在目前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大多把江南或太湖流域视为一个独立

的、统一的区域来看待。但是在江南这一大区域中，是否还存在着不同的次区域？当人们在谈论历史时期江南的某些特点时，是否适用于江南所有地区？事实上在看似一体的江南区域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偏差”。如太湖流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既是同一区域，如湖州府，也存在着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经济的、文化的。当我们在论述江南在宋元明清的变迁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同一区域之间的这种差异性，“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宋时期所达到的商业化水准，其他大部分中心地区只是到明清时期才达到。不但内地逐渐地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且地区间的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¹⁾在某个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性有时比同一性更富有历史启迪。而这种差异直到今天，仍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无形的作用。区域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方面，还体现在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方面：不同区域经济开发的进程与开发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正因为如此，苕溪流域作为江南大区域中的次区域，人们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苕溪流域在江南及太湖流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还不甚了解。

其二，从流域史角度来展开区域研究，在目前学术界，还尚未深入。

从流域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目前主要限于一些大河、大湖等，如长江流域、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史》可以说

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关于本区域流域史的一部著作，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域史研究。鲁西奇对汉江流域开发史的研究，在流域史研究方面应该说具有领先的意义。

总的说来，有关流域史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个理论空白。正如日本学者鹤间幸所指出的，“以河川为对象的研究，虽然在水利史、历史地理学、神话学等领域中得到了发展，但在通过河川流域设定某种地域，从而使地域史的研究得以自觉展开方面，还未能形成独立的领域。”⁽²⁾

二、本书研究对象的界定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我们将要研究的基本对象作一界定。

当我们把研究对象指向江南时，我们至少要对“江南”所指称的范围，作一番梳理。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对江南的界定是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代扬州、荆州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其实，江南在各个时期所指称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

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可见今湖南西部（黔中郡）是当时楚国的江南地。当时江南南界一直至南岭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载：“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是为零陵。”九疑山即南岭山脉，在湖南南部。裴驥在对《史记·货殖列传》作《集注》时引徐广言：“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史记·货殖列传》）可见江南有时指具体的特定区域，有时范围极其宽泛。《汉书·地理志》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在汉代时，江南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区域存在于北方人观念中。大体上江南的地域指南岭以北，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

相对于洞庭湖南北而言，今皖南、苏南一带在秦汉时期，以江东著称。之所以称江东，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东北走向，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渡东被视为往东，而非往南。这一线以西被称为江西，所以陈胜起兵于大泽乡，史称“江西皆反”。三国时，孙权割据江东建立吴国，所以三国时江东常指孙吴。同时，古代习惯面对江源，又可称江两岸为左右，东为左，因此江东在魏晋后又习称江左。六朝皆都南京，时人就称之为“偏安江左”。在魏晋还有一词“江表”，这显然是中原人士所称呼。但是“江南”的外延在六朝以前要比江东来得广泛，如汉初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兼有江北的东阳（后改为广陵，今扬州）、江南的会稽（又称吴郡，治苏州）及鄣郡（后改为丹阳）三郡之地。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唐代时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但即使在唐代，

江南一语的用法，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畴，韩愈所说的“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江南，指的其实是江淮以南的整个东南地区。到了两宋时期，两浙路所包括的苏南及浙江全境，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明清时期的江南，李伯重认为包括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李伯重是从太湖水系来界定经济区的，这八府一州“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³⁾江南的另一说法是包括苏松常嘉湖及镇江和杭州七府，如明代顾鼎臣所言“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从区域自然环境看，镇江和杭州在太湖以外，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两府的税粮要远逊于其他五府，所以江南这一概念的最内核应当为苏松常嘉湖五府，即苏南和浙北。明代大学士丘浚所言“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事实上在清后期，七府并提就不常见了。

就本书而言，“江南”只是作为苕溪流域次区域得以存在的一个背景，所以本书并不专门讨论江南的范畴——尽管我们认同明代丘浚的说法。

苕溪（Tiao Rivulet）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是太湖流域的主要水源，主要包括东、西苕溪二大水系。它们分别发源于天目山南北两坡，“苕溪有二源：一曰东苕溪，出天目之阳，东流至杭州府临安、余杭、钱塘县，又东北经湖州府德清县为余不溪，北至湖州城中为霅溪；一曰西苕溪，出天目之阴，东北流经孝丰县，又北经安吉县，又东北经长兴县至湖州城中，两溪合流，由

小梅、大钱两湖口入于太湖。”⁽⁴⁾其中东苕溪是浙江省第五大河流，干流全长 165 公里，西苕溪干流全长 145 公里。其流域范围主要包括今属杭州市的余杭区和临安市以及今湖州全境。

所谓流域经济圈 (Drainage Area Economic Belt DAEB) 就是以流域为主导，由流域干支流一定范围内经济区域（主要由流域的吸引域确定）所形成的一个具有某种特定结构的树支形区域（地域）经济系统。

苕溪流域经济圈 (The Tiao Rivulet Drainage Economic Belt)，就是基于苕溪干支流为辐射所形成的一种流域经济系统。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以东西苕溪及其支流为腹地。

作为经济圈，苕溪流域同样具有一般空间结构的基本特性：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区域性。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苕溪流域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具体展开。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书力求将苕溪流域作为一个经济地域，从区域史、流域史的视角，运用区域开发和区域发展理论来剖析。主要采纳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理论有：

第一，区域史研究方法：既然本书称之为“区域社会研究”，这就是说我们力图把苕溪流域作为江南区域中的一个次区域整体，从区域史的角度来分析。因此，区域史研究方法无疑是